

中学生课外阅读推荐读物导读丛书

《女神》

导 读

丁亚芳 著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诗性的成长	1
二、诗与爱的交响	14
三、诗兴的爆发	31
四、“女神”的引领	48
五、诗神与泛神	64
六、诗思的萃现	80
七、博多湾风影	94
八、古悠的诗魂	106
九、“说不尽”的《女神》.....	117

1921年，郭沫若向寂寞的新诗坛奉献出了他的诗集《女神》，并殷殷地期望通过这诗集，去在“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”，“把他们的心弦拨动”，“把他们的智光点燃”。当这部饱含着澎湃诗情，洋溢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的新诗集刚一问世，便像“一颗炸弹”震动了文坛，引起强烈的反响，那情形正好像是对他殷切期待的回应。

80年风云变幻，给《女神》留下了密密匝匝的时代年轮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耀眼的光芒。如果我们透过历史的尘雾，回视诗人清晰而独特的来路，就自然会觉得，《女神》能取得如此惊天动地的巨大成功并非偶然。

一、诗性的成长

四川省乐山市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历史文化

名城，旧称嘉州。嘉州之北有海棠香麓，是旧府署所在地，故这里又有“海棠香国”之称。嘉州自古就以风景秀丽闻名，吸引历代骚人墨客为之赞美与吟咏。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曾遍游这里的山山水水，在流连忘返之际，留下了“但愿身为汉嘉守，载酒时作凌云游”的佳句。

从乐山经大渡河逆流而上，行 75 里可达沙湾镇。沙湾位于峨眉山下，依山傍水，景色迷人。峨眉山共有三座山峰，通常所说的峨眉山即“大峨山”，山的第二峰，俗称二峨，又名绥山，三峨在沙湾的正南面，又名美女峰。三座峰错落有致，随着寒暑、阴晴的变化，其姿态和色彩都各有参差。每逢阴天或晚上，山头隐约可见，黑魃魃的，有些阴森；而一到晴天，则层次分明，雾绕山腰，像一幅泼墨山水画。郭沫若的家便在二峨山下，背靠大山，门前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。郭沫若原名郭开贞，“沫若”的笔名，是他留学日本最初发表诗作时所取，乃是家乡两条河流——沫水和若水的并称，由此可见诗人虽然

诗兴遨游于东海，诗绪却始终牵动着故乡。大渡河又称铜河，沫水；若水，是青衣江的古名。青衣江古代又称平羌江，也是一条著名的河流。李白“峨眉山月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”的名句，描绘的就是这里的风光。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曾刻过一枚图章：“家在峨眉画里”，来形容家乡的美丽。正是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里，郭沫若度过了他的童年。郭沫若对故乡是满怀深情的，他曾多次引用古代文人的诗句“天下山水之盛在蜀，蜀之山水在嘉州”来赞美自己的故乡，也曾把自己比作峨眉山上的一滴清泉，随着山风的吹拂，滴落在大渡河，滴落在扬子江，汇入奔腾的大海。他一生念念不忘峨眉山、不忘大渡河。故乡优美的自然风景，启迪了他的心灵，陶冶了他的性情；风光旖旎的峨眉山孕育了他不尽的诗思，滔滔不绝的大渡河浇灌了他蔚郁的诗情。

1892年11月16日，郭沫若出生在这儿的一个中等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。他的祖上靠

“两片麻布”起家，渐渐殷实发达起来。到郭沫若记事时，他的家庭已成为田连阡陌的地主，而且从他的祖父一代开始重视读书，凡成绩突出者给以奖励，故而，家中先后有数人进学。父亲郭朝沛，也常以“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”的家训教育子女，并在旧居后花园设绥山馆为家族子弟延师授业。1910年，郭沫若大哥留学归国，在北京还中过法科举人，郭家那时已成为当地公认的“书香门第”。而最早给予郭沫若以文学熏陶的是他的母亲。母亲杜荪福自幼饱尝忧患，深知生活甘苦，是一位聪颖通达的妇女。她虽未上过学，但耳濡目染，能背诵一些诗词，工于刺绣，性格开朗、乐观，对子女既非常严格又不失慈爱。在郭沫若二三岁时，母亲已经教他背唐人绝句，许多诗他都背得琅琅上口，其中如“淡淡长江水，悠悠远客情。落花相与恨，到地亦无声”这首诗，一直到晚年还保留在他的记忆中。而在他的不朽之作《女神》中，除了表现激昂慷慨、汪洋恣肆的豪情的诗篇外，那些占有很

大比例的恬淡优雅的诗作，正与童年时代母亲的诗教密切相关。一个两三岁的孩童吟诵“落花相与恨”之类的诗句，那情形似乎有些滑稽，然而这种感时伤春的诗情在郭沫若诗性思维的原野中并没有荒芜，《女神》中的许多篇什正鲜明地留下了这类印记，难怪《春愁》中的“凄迷”、“萧条”的感叹被表现得那么古意盎然。

母亲就这样给了他“诗教的第一课”。他也把母亲教他念诗当作“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”。古代诗歌的音乐性、节奏感很早便把他引入了诗的世界，播在他幼小心灵里的诗的种子便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不断萌发新芽。“出于自己的要求”，在他四岁半时，父亲就领他去家塾拜师学艺。发蒙读的是《三字经》，虽然其形式也像诗一样地整饬，可阐述的是很暧昧的哲学问题，全然没有诗性，自然使他感到乏味，于是，“读不上三天就逃起学来”，结果是父亲用“强制手段”把他“抱进学堂去”。

学堂内的失望并没有使他绝望。学堂以

外,山边河畔广泛流传着的儿歌、童谣,又成了他诗性徜徉的沃野,满足了他对于诗的热切的渴望。在这些歌谣中,星月之夜常常充当主角,因为明月繁星在儿童印象中总是最深刻、最感神秘的。晶莹的天空里,星星在眨着眼睛,一轮皓月当空,无论你走到哪里,月亮都跟着走,儿童极易陶醉在这种幻境之中。“月儿走,我也走,月儿教我提烧酒。烧酒倒好吃,月儿不拿给我吃。”这首《月儿走》的儿歌描绘的就是这种意境。另一首《月光光》描绘的是新月光下,树影婆娑,晶晶流着的河畔,一个年轻的女子正提着洗衣篮,去河边洗衣裳。她一面走,一面唱歌。这是何等美妙的情景!郭沫若曾说,他后来能记忆的儿歌,比较有价值的就有这两首,“儿时和姐妹兄弟们在峨眉山下望月,有时会顺口唱出这些儿歌来,那时的快乐,真是天国的了”。另外,四川地方的民歌、童谣、童话、传说甚至川戏、木偶戏等等,极富幻想和艺术魅力,给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。甚至农夫插秧时唱的秧

歌,大渡河上的船夫号子,和小伙伴们月夜对坐时唱的儿歌等等,都给郭沫若的童年时代增添了无穷的乐趣,也启迪了他童稚的心灵,引发出多少美妙的遐想!郭沫若后来曾回忆说:“《熊家婆》的女丐,《游金河》的场面,赶夜路时母亲的招魂,封火砖墙的阴森,——虽然很模糊,可确确实实是留在记忆里的。”所有这些,都大大丰富了郭沫若“诗的修养”的内容,而且一直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。他继《女神》之后奉献出的诗集便是《星空》,并经常表示对于康德的那句名言的认同:“头上的星空”和“心中的道德律”常常最能令他感动。其实在写《女神》的时候,或者说,他开始写新诗的时候,明月、繁星的意象,就成了他基本的写作对象。《夜步十里松原》歌颂天空的“高超,自由,雄浑,清寥”,正是通过“无数的明星”来展现的。《女神》以密集的意象歌颂太阳,而最富有诗性的却是“新月”或“残月”、“霁月”的描写。在《新月》与《白云》、《别离》、《霁月》等诗中,我们看到月儿像“镀金

的镰刀”,像“黄金梳儿”,分明散发着浓郁的乡谣民曲的气息。

郭沫若儿时接受的教育完全是旧式的。虽然家塾的教育,所授的多半是诗,以至到六七岁时《诗三百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诗千家》等已经“念得透熟”,但旧诗的格局,尤其是僵死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为他所满意,他后来将这些称为“诗的刑罚”。典型的“诗的刑罚”便是“作对子”。起初要求对两个字,然后对五个字,再后来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。有一件事给郭沫若的印象非常深,也使他备觉得意又常常忍俊不禁:大约是在他六岁时候,有一次先生和他们几个学生在家塾后面钓了鱼回来,先生评字的时候,在纸背上戏写了“钓鱼”两个字,然后要学生出对。郭沫若恰巧那时候刚刚看过了“杨香打虎”的木人戏不久,便脱口叫出“打虎”。没想到这简单的一对竟令先生拍案叫绝,反过来倒把少年郭沫若吓了一跳。后来先生遇到郭沫若的父亲,也连连称赞,说是“此子出口不凡,将来必成

大器”。对对子讲究虚实平仄，音律对仗，这对于连说话也不很流畅的孩子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事了。然而每隔三天一次的诗课，读完该读的书后，便对着桌子苦思冥想，把“二月春光好”“三月春风好”“四月春光好”以至一年十二个月都用完了，对不上不得出去玩。就这样从上午到下午，由下午到天黑，“起初是无聊的枯坐，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”。仍然做不出，就急得只有流眼泪了。这种所谓“诗刑”受了两三年。不过，郭沫若自己也认为，“在为受这‘诗刑’的准备上我也得到过一点好处”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逐渐掌握了字的平仄、音调、诗的对仗、韵律等，也逐渐摸索到写诗的技巧。这些旧诗技巧在《女神》中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。作为新诗集，《女神》中的许多篇什常洋溢着抑扬顿挫、律令有序的音乐感，则完全得益于这样的所谓“诗刑”。

事实上，郭沫若在十岁左右就开始写诗，并以诗抒写自己在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了。有一

首题为《村居即景》的五言律诗是迄今发现的郭沫若最早的诗歌，大约作于 1904 年。诗中写道：“闲居无所事，散步宅前田。屋角炊烟起，山腰浓雾眠。牧童横竹笛，村媪卖花钿。野鸟相呼急，双双浴水边。”全诗以淡雅的笔墨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乡村图画，景色优美，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且对仗工整，音韵和谐，很有点陶渊明、王维的“诗味”。郭沫若后来曾经说过，在唐诗中他喜欢王维，喜欢李白、柳宗元，他认为陶渊明、王维的诗“有深度的透明”，其感触如玉。李白写的诗，可以说只有平面的透明，而陶、王都有立体的透明。显然，对于唐诗的好恶在他幼年时就已经初显端倪了。

在嘉定读小学、中学的四年间，郭沫若依然诗心蓬勃。他倾慕古人，追步前贤，所吟诗作常抒写孤高自赏的情怀，如“此地存苏迹，可曾载酒来”（《苏溪弄筏口占》），“逸性怀陶隐，狂歌和狗屠”（《九月九日赏菊咏怀》）等，也时有神思如飞，想落天外的手笔，如“两三渔火疑星落，千百

帆檣戴月收。借此扁舟宜载酒，明朝当作凌云游”（《夜泊嘉州作》）等，想像丰富，意境开阔，颇有唐诗的韵味。一首《泛舟谣》还表现了少年郭沫若渴望“奋飞”，不甘蛰居一隅，不甘当井底之蛙，要到成都去，到京津沪去，到日本、欧美去，追求知识、寻求更大的发展的远大志向。在成都读书时，郭沫若依然是“类似被强迫地”继续朝文学的道路上跑。这时的诗作中颇多直接表现思想苦闷和诗酒生活的，如《澡室狂吟》：“我已久存厌世心，每思涤虑脱尘俗。”《三月十四日暮同友人游怡园作》：“人生到处须行乐，沽酒临邛莫用赊。”《和李大感怀》：“读罢新诗瞪目视，娱情聊向酒家眠。”从这些旧诗习作中，人们不难发现，传统文人的诗酒情趣，已经深深地植入了少年郭沫若的诗心，成为他《女神》时代迎候并消融西方酒神传统的美学酵素。

郭沫若曾说他“不甚喜欢杜甫”，但在成都读书时所写的许多感时述怀的诗篇却很有杜诗的韵味。他用杜甫《秋兴八首》的原韵所作的

《感时八首》最能代表这个时期他的诗歌创作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。如第一首：“苦恨年年病作家，韶光催促鬓双华。异乡滋味尝将尽，诗酒生涯兴未赊。”显然，从杜甫的诗学传统中，他仍然能体验到“诗酒”兴味，可杜甫的现实关怀给了这位少年诗人以丰富的精神滋养，这使得他跳越自我情愫，怀着沉重的心情关注辛亥革命后，清王朝虽被推翻，但人民的灾难依然深重的残酷现实。如《感时八首》第七首：“兔走乌飞又一年，武昌旧事已如烟。眈眈群虎犹环视，岌岌醒狮尚倒悬。”描述了辛亥革命之后，群虎环视，醒狮倒悬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形。由杜诗传统滋养而成的如此深沉的忧国忧民之心，多少年后便发而成为《女神》中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。《女神》中的诗虽然大都勃发着浪漫主义风格，但其中最重要、最有代表性的如《凤凰涅槃》、《女神之再生》等，又都浓重地透射出现实的苦难，黑暗的旧中国在这些诗篇中显现为“脓血污秽着的屠场”，“悲哀充塞着的囚牢”，“群鬼

叫号着的坟墓”等等，正是在这样的苦难关怀中，诗人企盼着民族的涅槃，祖国的新生。

少年时代的诗歌教养，无论是来自于慈爱的母亲，还是来自于民间文化，抑或来自于他自己信步漫游的传统诗学世界，都似乎有着命定的矢向，有着同一的目标，这就是塑造一个属于五四的诗人，塑造一个写出《女神》的诗歌巨匠，或者说，塑造一个能够塑造女神的诗神。

二、诗与爱的交响

郭沫若在旧体诗的世界里体尝到了乐趣，但却远没有达到他所谓的“诗的觉醒”。引领他进入“诗的觉醒期”的，乃是远离了中国旧诗格律的外国诗，从此，他的诗思沾染了异国的熏香，于是，他注定会成为一个新诗人。

最先让他从整饬的旧诗格律中感受到另一番诗美的，是他 1913 年接触到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。朗费罗的《箭与歌》使他“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”，感受到如“诗经国风”才感受到的诗意图境的“清新”、“美妙”：“我向空中吐出一支歌，不知它落到何方，谁有这样尖、这样强的眼力，以追上歌声的飞翔？……很久很久以后……还有那支歌，也被我找到，从头到尾藏在朋友的心间。”带着这种还很朦胧的“诗的

觉醒”，他来到了日本，在这样一个诗歌并不发达的国度里，他幸运地接触到了泰戈尔、海涅、惠特曼、歌德等诗界巨子。

1913年，印度诗人泰戈尔因诗集《吉檀伽利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因而轰动了欧美，走向了世界。当时，泰戈尔也通过欧美诗坛传入到中国。冰心、郑振铎、王统照、徐志摩都曾受过他的影响。王统照、冰心还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。郭沫若则在日本的“泰戈尔热”中阅读了泰戈尔。他这时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。一天，他的室友拿回来几章油印的英文诗，原来是泰戈尔的《新月集》中选出来的几首，有：《岸上》(On the Seashore)、《睡眠的偷儿》(Sleep-Stealer)、《婴儿的世界》(Baby's World)、《云与波》(Clouds and Waves)等。于是，郭沫若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诗，觉得这些诗与读过的其他英语诗歌不同，与中国的旧诗崇尚格律雕琢也区别很大。这些诗没有韵脚，许多是单节或对仗的诗，特别是那清新和平易的风格使他感觉